

景觀

中國教會大學建築

——中西文化交匯的案例

• 董 黎

中國傳統古典建築復興，是指本世紀20年代左右開始的，採用當時西方建築的工程技術和建築材料，在平面設計上符合西方建築的功能主義設計觀念，外部造型模仿或挪用中國宮殿寺廟建築構圖元素並與西方建築相揉合的新建築式樣。十分有趣的是，在檢討這種中西建築風格融合之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教會大學起了關鍵作用。即教會大學不僅是中國教育近代化的示範，而且還是中國建築近代化過程的關鍵點。研究這個案例，對理解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所謂近代民族風格的形成就有某種啟發性。

一 中國傳統的建築文化觀念

中國數千年的建築文化傳統，只有幾部經驗之談，如宋《營造法式》、清《工程則例》流傳後世。在中國傳統的「重道輕藝」的文化價值觀裏，「建築只是匠人之術，建築者只是個(勞力的)僕役，其道其人都為士大夫所

不齒」^①。中國士大夫說過那麼多深奧玄妙的話，可是涉及到建築的當以老子一句話最出名：「埴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②從這句話可知，建築不過是與做瓦罐相並列的一種技藝。按照中國傳統文化中道器兩分的思維模式，當西方建築形態傳入中國時，士大夫們也僅僅是把它作為一種新奇的器具來對待，就如同西方鐘錶一樣，封建帝王還修造了西洋式的圓明園來補充和點綴宮庭生活。由於建築仍被視為一種器具，當時中國思想界和文化界的「中體西用」之爭辯、「用夏變夷」之幻想，在建築上並沒有甚麼反映。中國開放口岸之後，外國租界所展示的工業文明成果，更令國人將建築技術和建築形式混淆起來，以為移植西方建築形式就是建築現代化。所以，張之洞辦洋務新政，大多採用西式廠房^③；武昌建諮議局，採用西方古典形式的紅樓^④。各大都會城市相繼興起「闌闌多仿西式」的新潮，連孫中山先生也在「建國大略」中提出：「居室為文明一因子，人類由

是所得之快樂，較之衣食更多……改建一切居室以合乎近世安適方便之勢，乃勢所必至。」

顯然，那時的中國人是將西方建築當作一種新科學來看待了，但卻沒能聯想到建築與文化，尤其是與宗教神學的關係。於是，在本世紀初，有着數千年建築文化傳統的中國，第一次派留學生出洋學建築，且多是赴美求學^⑤，期待能產生像西方那樣的建築師。此時，國人眼中的建築師，還只是指工程師與匠人之區別而已。

正因為如此，二十世紀中國民族傳統古典建築復興開創者的角色，竟然主要是由傳教士擔當起來，其風格的形成也見諸教會大學建築。

二 早期西方傳教士眼中的中國古典建築

中國近代的西學東漸，傳教士充當了先行者的角色，在早期使華傳教士的活動中，與建築有關的記載要算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 (P. Matteo Ricci)。1583年，利瑪竇到了廣東肇慶，「請求一塊小小的空地建造一處寓所和一處教堂，以便在那裏唸經和祈禱，隱居和默想」^⑥，尚無資料表明他採用的是西方建築形式。1601年1月4日，利瑪竇偕同西班牙傳教士龐迪我 (Didacus Pantoja) 終於身着儒裝來到北京，受到明萬曆帝的厚待，賜住於宣武門外。1605年他建造了北京的第一座天主教堂，採用的是中國式建築風格，但「其主立面在中國建築中屬山牆，致令東方風水先生們大惑不解」^⑦。

1704年(康熙十一年)，教皇克里蒙十世 (Clement X) 明令中國教徒停止敬天拜祖。1720年，康熙皇帝則頒布諭示禁教，將傳教士驅逐到澳門。至此，中西文化交流進入停滯狀態，彼此敵對和鄙視，都沒有留下甚麼好感，傳教士還將這種情緒擴延到中國古典建築上。在1690年，傳教士勒康特 (Pere Louiste Comte) 就寫到：中國傳統的古典建築「對外國人來說，非常不舒服的，而且必然會連那些對真正建築有一點概念的人都會感到不悅」^⑧。中國禁教之後，傳教士對中國古典建築的成見更加強烈。1735年，傳教士杜浩德 (Du Halde) 乾脆否認了中國古典建築的藝術成就，他寫道^⑨：

本世紀初，設立教會大學的中國城市之分布



如果與我們的建築相比較的話，（中國）富人和貴族之宅邸根本不屑一提。如果稱那些建築為宮殿的話，那將是種濫用，那些建築只不過是比一般房舍建得高一些的樓房而已。

客觀地說，西方傳教士之所以對中國古典建築如此反感，除了文化上的不適應之外，還有純屬建築學意義上的問題。中國古典建築是一種方形或接近3:2比例的矩形平面形式，主入口在建築平面的寬邊正中，開門即是建築的主要活動空間，單體建築的功能類型只是隨着家具陳設的不同而改變，是一種以不變應萬變的建築形態，其環境氣氛是通過院落組群的空間變化來達到的。而西方建築自古希臘起就有了單體功能類型之分，教堂建築就是一種根據宗教儀式所需的特有形態，從古希臘廟宇的美加侖室（Megaron）到後來的巴西利卡式（Basilica）、集中式、十字式，都是規則的長方形平面，以狹端為正立面，用兩排或四排柱子縱分長方形平面，中間部分是窄而高的狹長空間，有利於醞釀一種宗教的神秘感，最後才是空間的高潮——基督祭壇，建築的環境氣氛是以建築單體空間的內部變化方式來形成的。顯然，西方宗教儀式無法與中國古建築形態相適應。同樣，傳教士也不可能一下子認同以不變應萬變的建築觀念。

事實上，早期來華的傳教士對中國文化並無興趣，他們對待中國傳統古典建築的成見在數百年內沒有質的改變。直到1914年，莫勒（Arthur Evans Moule）為有志到中國傳教的教會學生寫的手冊中還這樣評論^⑩：

中國建築經常是認為如果視為藝術是幾乎不存在的，一如在中國柳景圖案中所描繪之怪誕、奇異之圖案一樣。的確，在一個如此古老的國家，如此熟悉文明藝術、教育與古代紀念建築之文獻的民族中，存在着如此少之古代建築，在規劃和創作年代久遠之如此的稀少是件令人迷惑的事。……在中國最優雅，最詩情畫意，最藝術化的是廟宇的式樣，可在其中並不存在堅固性與莊嚴。

這種評論雖比以前的認識前進了一步，但在西方人的建築審美觀中，缺乏堅固和莊嚴的建築，其文化價值也就無從談起了。而西方傳教士認識到應吸收中國傳統建築，是同他們的傳教事業在中國受到越來越大的阻力聯繫在一起的。

三 另一種西體中用

鴉片戰爭之後，西方的政客和商人已可以毫無顧忌地將各種建築形式引入中國，傳教士也在中國各地城鎮和鄉村建起了西方中世紀式樣的教堂。此時，中國人廣泛地接受了西方建築形式。後因傳教引起的大小教案共達四百多起（大部分發生在十九世紀的後三十年）^⑪，致令國人對教會事物產生排拒，尤以教會建築首當其衝。在1900年的庚子教案中，僅天主教堂就損失四分之三左右。據北京的統計，被焚毀的教堂18所，男學堂12所，女學堂11所，傳道學堂4所^⑫。

教堂具有基督教文化的表象特徵，在歷次教案中屢屢被毀，這一事



成都華西協合大學
懷德堂

實在社會一般史上解釋成反帝愛國運動的行為體現。如果從建築史的角度來考察，我們還可以看到其中包含的另一層意義，即對中國人來說，自此之後改變了以道器分離的思維習慣來看待建築，終於將建築視為一種文化參照物。對傳教士來說，中國民眾對教會的普遍敵對心理，迫使傳教活動改用尊重中國傳統文化的形式，力求得到中國民眾的認同和好感，因此而發展了與教會相關的教育和慈善事業。按照西方人的思維習慣，作為一種姿態，他們也很自然地想到建築的文化參照物的表象效應。因此，原本認為互不相容的中西建築文化觀念，終於找到了一處共通點。

有了建築文化觀念的共通點，就需要創造一種能滿足各自不同的文化動機並具有表象特徵的新的建築形式。創造新建築形式的早期嘗試由傳教士零散地進行，他們大多是將中國古典建築的某些局部加在西式建築體量上作為裝飾構件，模仿的部位與手法亦無定勢，反映出西方建築形態對

中國傳統古典建築文化的一種妥協。極端的案例還有完全照搬中國古典建築式樣的做法。這些早期的嘗試沒有形成一種成熟的建築風格，缺乏相應的一貫性、獨特性和穩定性，因此影響也較小。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正式頒布詔令，廢止科舉考試，建立仿照西方公學制度的教育體系，這一舉措使教會的教育事業得到新的發展機會。二十世紀的前三十年，教會的高等教育事業特別興盛，許多教會都將所屬學院和書院擴展成教會大學或新建教會大學。這些教會大學成立之時，大都購地遷址並興建大批新校舍。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這批新校舍的興建算得上中國最大規模的建設活動之一，也給中國傳統古典建築提供了復興的契機。教會大學的成立，不僅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而且是中國近代建築史上的轉折點之一。教會大學建築形態之構成以及後來的發展變化，均應視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

四 教會大學建築形態的文化因素

教會大學建築的興建過程中，正值天主教實施「中國化」計劃和基督教「本色運動」展開之時，許多傳教士在此期間，加深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從而推動了在華教會的世俗化、本土化，為促進中西文化的正常交流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天主教會在決定實施「中國化」計劃之後，1922年8月9日，由教皇庇護十一(Pius. X.D.)委派的剛恆毅樞機主教(Most Rev Constartini)擔任了第一任天主教廷駐華使節。1924年，意大利政府調撥了一千萬里拉給在華的天主教各教會^③。剛恆毅在擔任駐華主教8年期間，盡力實施了天主教「中國化」的設想，他還將自己的傳教事業與中國古典建築藝術融合起來。1923年，剛恆毅到任不久就致函教庭長，明確地指出^④：

建築對我們傳教的人，不只是美術問題，而實是吾人傳教的一種方法。我們既在中國宣傳福音，(建築)理應採用中國藝術，才能表現出吾人尊重和愛好這廣大民族的文化、智慧的傳統。採用中國藝術也正是肯定了天主教的「大公精神」。

從建築學的角度來說，剛恆毅還是一個具有較高建築藝術修養的傳教士，他反對盲目照搬中國古典建築形式，並頗有見解地說^⑤：

吾人當鑽研中國建築術的精髓，使之天主教化，而產生新面目，絕不是抄襲廟宇的形式或拼湊些不倫不類的中國元素而已，乃是要學習中國建築與美術的精華，用以表現出天主教的思想。

如果在這些話中除去宗教因素，我們可以驚訝地發現，剛恆毅的見解與中

北京協和醫學院
病房樓



國建築理論界有關中國傳統古典建築的創新和繼承的共識，並無質的差別。

1925年，庇護十一又捐贈了十萬里拉供輔仁大學改制之用，這一機會使剛恆毅有可能將自己的見解付諸實現。1929年，輔仁大學在北京購得興建校舍的用地，剛恆毅聘請了比利時的一個傳教士藝術家設計中國傳統古典建築式樣的新校舍。在施工奠基時，剛恆毅發表了有關輔仁大學建設方針的演說詞^⑧：

輔仁大學整個建築採用中國古典藝術形式，象徵着對中國文化的尊重和信仰，我們很悲痛的看到中國舉世無雙的古老藝術倒塌、拆毀或棄而不修，我們要在新文化運動中保留着中國古老的文化藝術，但此建築的形式不是一座無生氣的複製品，而是象徵着中國文化復興與時代之需要。

這段演說詞清楚地表明，教會大學建築形態的構成並不是出於對某種建築風格的形象特徵來考慮的，其設計思想是由廣義的社會效應和文化內涵所決定的。以建築表現某一文化思潮或某一時代風尚，在西方似乎已成慣例，而在中國則意義非同尋常。因此，筆者認為：

(1) 教會大學建築將西方建築文化觀念引入中國並成功地進行實踐，是中西文化雙向流動的典型範例，也是中國近現代建築史的關鍵點。

(2) 不管何人始作俑，教會大學建築形態事實上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表象參照物。

五 中西結合風格的形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利用戰爭的機會迅速擴展了在華的教育事業，從1914-1918年之間，在華新設立的教會學校有70%都是美國基督教會開辦的^⑨。由於教會大學在中國近代教育中的特殊地位和學術水平，從國外和國內都爭取到新校舍的建築經費，使教會大學有能力進行較大規模的建設活動，促使中國古典建築復興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1921年9月，美國基督教會組織了「中華教育調查團」，該團在華訪問了36個城市和五百多所各級學校之後，正式表明了教會學校的建校方針，即「教會學校必須盡快地去掉它們的洋氣……，必須盡快地、徹底地中國化和基督化，如果它要吸引學生和取得中國人的經濟支持的話。……在性質上徹底基督化、在氣氛上徹底中國化。把效率提到一個新的高度，就可以提供服務，而如果缺少這些特徵，那就將一事無成」^⑩。此處可注意，造就「氣氛上徹底中國化」和教會大學的外部「特徵」，其主要手段就是將西方的工程技術和理性主義的設計手法與中國傳統古典建築的形式相融合，是一種西方人所理解的「中體西用」，也是中西建築文化雙向交流的一種嘗試。

這一嘗試在燕京大學的建築設計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1920年，燕京大學選定了北京市郊的海淀淑春園作為新校址。第一任校長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就任後，確定了燕大的辦學方針：「我要使燕京大學在氣氛和影響上成為徹



燕京大學穆樓

底地基督化，而同時又要甚至不使人看出它是傳教運動的一部分。」^⑩為此，司徒雷登提出了建校的四項目標，其中第三項就是「要使燕大既有一個中國式的環境，同時又具有國際性，能促進國際間的相互了解，這是培養具有愛國主義昇華的世界公民唯一切實的保證」^⑪。為了創造這種「中國式的環境」，司徒雷登特地聘請了美籍建築師墨菲 (Henry K. Murphy) 負責校園規劃和建築設計。在中國傳統古典建築復興的過程中，墨菲無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於1899年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在美曾以設計東方殖民式建築而聞名。墨菲從1914年起開始從事中國傳統古典建築的研究及建築活動，還擔任了國民政府的建築顧問。在華期間，墨菲先後主持設計了清華大學規劃 (1914年)，廣州嶺南大學 (1920年)，湖南湘雅醫學院 (1920年)，金陵女子大學 (1921-1923年)，北京燕京大學 (1920-1926年) 等校園建築，有許多中西合璧式的開山

之作。同時，墨菲的建築事務所還培養了一批中國傳統古典建築復興的中堅力量。如中國近代最著名的建築師呂彥直先生就曾供職於墨菲門下，協助墨菲進行中國古典建築的研究，並參與金陵女子大學和燕京大學的設計工作。在此之後，他奪得南京中山陵設計競賽的頭獎，他與墨菲的師承淵源關係一目了然。由於專業建築師的參與，使得教會大學的建築形態日臻完善和成熟，其外部特徵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在燕京大學的建造之初，司徒雷登提出了新校舍建築的設想，盡量在學校建築方面中國化，要採用宮殿式的教學大樓，廟宇式的學校大門，校園裏要點綴一些華表、石獅之類的中國傳統建築小品。在墨菲的主持之下，燕京大學陸續建造了88幢建築，總面積達2.5萬平方米，再加之有當時中國最漂亮的校園，燕京大學就被視為中國傳統古典建築復興的典範作品之一。1926年，燕京大學建成遷校，司徒雷登在落成儀式上講明了建

造校舍的設計構思^②：

我們一開始就決定按中國的建築形式來建造校舍，室外設計了優美的飛檐和華麗的彩色圖案，而主體結構完全是鋼筋混凝土的，並配以現代化的照明，取暖和管道設施。這樣，校舍本身就象徵着我們辦學的目標，也就是要保存中國最優秀的文化遺產。……並以此作為中國文化和現代知識精華的象徵。

西方傳教士首先利用當時先進的工程技術和新型建築材料，創造出中西合璧式的教會大學建築新式樣，拉開了中國傳統古典建築復興的序幕。這一事件說明了甚麼呢？或許它表現了文化融合本身的某種規律性。這就是：處於相對落後狀態的國家，在其現代化的初期，本土人要求全盤西化，而西方教會卻出自不同的動機，站在民族主義和鄉土意識的立場，力求保存和發展本土的傳統文化。隨着本土現代化過程的展開，民族傳統文化又以某種新的形式來抵觸外來文化，表現出本民族傳統意識的離異與回歸規律。

註釋

- ① 《梁思成文集》，第二卷（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4），頁220。
 ② 盧育三：《老子釋義》（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頁74-75。
 ③ 王紹周：《中國近代建築圖集》（上海科技出版社，1989），頁39。
 ④ 李德喜：〈湖北諮議局建築〉，載《第三次中國近代建築史研討會論

文集》（中國建工出版社，1991），頁14。

⑤ 黃健敏：〈中國建築教育溯往〉，《建築師》（台灣），1985年，第11期。

⑥ 衛三畏：《中國總論》，第二卷（1871），頁169；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

⑦ 《童寯文選》（東南大學出版社，1993），頁166。

⑧ 參見傅朝卿：〈傳教主義與中國古典式樣新建築〉，《建築師》（台灣），1992年，第12期。

⑨ O.R. Impey: *Chinoiserie: The Impact of Oriental Styles on Western Art and Decor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43.

⑩ A.E. Moule: *The Chinese People — Handbook on China*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14), pp. 89-90.

⑪ 同註⑥，顧長聲，頁126。

⑫⑬⑭⑮⑯ 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79），頁235、36；313、34；334；339；380。

⑰⑱ 剛恆毅等著：《中國天主教美術》（台灣：光啟出版社，1968），頁12；23-24。

⑲ 參見《輔大五十年》（台北：輔大出版社，1979），頁40。

⑳ John Leighton Stuart: *Fifty Years in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4), p. 66.

㉑ 蘇勇、樊剛：《燕園史話》（北京：工人出版社，1985），頁21。

董黎 1953年生，建築學博士。自1978年始，先後就讀於哈爾濱建築大學，重慶建築大學，日本神奈川大學，南京東南大學建築研究所。現任廣州華南建設學院副教授。